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南越国考古学研究

黄展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南越国考古学研究

黄展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越国考古学研究/黄展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6069 - 5

I. ①南… II. ①黄… III. ①南越(古族名)—考古学—研究 IV. ①K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83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5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王 琪 刘 杨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自序

我于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52年选读考古专业,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文革”以前主要从事汉唐两京(西安、洛阳)发掘,对中国南方考古资料接触很少。真正接触南越国考古资料开始于1983年参与主持广州南越王墓的发掘及其后的资料整理编写。1991年,《西汉南越王墓》发掘专著公开出版。事后相继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奖(1993)、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5)、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在发掘专著编写期间,我和麦英豪合写《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从南越国墓葬看南越国》。自撰《墓主与年代》(后来修订为《关于南越王墓的墓主问题》)、《丝缕玉衣和组玉佩》、《南越王墓出土文字资料汇考》。在发掘专著排印期间和出版以后,又陆续撰写《论南越国的青铜器》、《论南越国的铁器》、《南越王墓出土玉璧》、《南越政权与赵佗》,以及与南越国问题有关的一些文章。收入本书的就是这些文章的汇集,故定名《南越国考古学研究》。

下面把自己感觉比较重要的一些文章稍作介绍。

《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原是为《西汉南越王墓》的总结而写的。这篇文章突破过去发掘报告只总结该墓资料的写法,采取以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把前此发掘的南越国考古资料也适当收集进去。内容归纳为都城(番禺城)、农业经济、重要的手工业(下分冶铸业、制陶业、纺织业、漆器制造业、玻璃业、玉牙雕刻、金银工艺七节)、交通与贸易、度量衡制度、武器、墓葬七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把南越国和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南越国墓葬看南越国》的写作思路与《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基本相同。该文专门就南越国的政权建制、生产水平和社会结构作了阐述,

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南越王国。

古籍中的南越国史料,可靠的仅见于《史记·南越列传》、《汉书·南粤列传》及其他少数列传的简短记述。记述又局限在汉越关系、王位更迭方面。后人对南越国的社会经济、物质文化生活等情况,所知甚少。上面两篇文章属于概括性、综合性的叙述,缺乏深度,显然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所以,我又陆续写出论南越国出土的青铜器、铁器、丝缕玉衣、组玉佩、玉璧、提筒、动物纹牌饰、六夫人印、南越国自铸官印、南越王的饮食生活、水稻种植、海上交通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论南越国和南越王,也有少数跨越南越国时空的论著,例如《铜提筒考略》、《汉代南方牛耕和火耕水耨》、《广州汉代考古与海上交通》等。收入的这些文章,长短不一,写法大体相同,都是在忠实介绍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再按用途分类逐一分析,然后展开讨论。结论从资料中来,目的是填补文献史料在这些方面的空白,期望有助于对南越国的全方位认识。

南越王墓随葬器物上有很多铭刻、墨书、印章、封泥,可以用来对照或填补文献史料的缺失,所以,我又专门撰写了《南越王墓出土文字资料汇考》,文章开头先将墓中带有文字的随葬器物分类列表集中报道,然后归纳出二十二个专题,结合历史文献逐一考释。其中有不少用功较多且具有独到之处的见解。例如“文帝行玺”金印、“右夫人玺”金印、“景巷令”铜印、“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铜勾镰、“王命=车駟”铜虎节、“王四年相邦[张]义”铜戈等的考释。

2005年,南越王宫遗址264号井内发现木简一百多枚。这是岭南首次发现的汉代简册,当然受到格外重视。经初步释读后被认定是南越王宫早期记事简。承发掘主持人嘱托参与释读。收入本书的是从中选释的三十三枚。

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谁,这是大家格外关注的一件事。这座墓的发掘简报,根据墓主身上有“文帝行玺”金印、“帝印”玉印、“赵昧”玉印和有关的许多出土器物,肯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即《史记》、《汉书》本传中的赵胡。因名章与史汉记载不合,有些学者提出多种不同意见,想改变墓主所属世系,并牵动南越国存亡年限等重大问题。所以我在该墓发掘简报的基础上写了《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墓主问题》,从三个方面作了详细的申辩,论证

《史记》、《汉书》二书均谓南越国“传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是正确的,不能随意更改。虽然目前还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释,但都不能动摇墓主赵昧即《史记》、《汉书》记载的赵佗之孙赵胡的结论。

为了增强说服力,我又写了《赵佗年寿与第二代南越王》,澄清赵佗的实际年龄和“处粤”时间,证明《史记》记赵佗“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不误。《汉书》脱一“卒”字,并不影响全句本意。

等级仅次于南越王墓的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其墓主是谁,同样引起学者的关注,出现多种不同的推测。收入本书的《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根据墓葬形制、人殉制度、出土的文字资料、南越国的分封制度和瓯骆故地问题五个方面,论证罗泊湾1号墓可能是受南越王册封的当地土著首领西瓯君的墓葬,2号墓可能是西瓯君的夫人,或嗣位的西瓯君夫人。

南越国开国国主赵佗,在位六十七年,占南越国存世年限的三分之二有余。南越国制定和推行的各项政策,以及对岭南历史的影响,皆与赵佗有关。所以,我又写了《南越政权与赵佗》一文。在简单介绍南越国的兴亡历史之后,专门就赵佗“割据”岭南的功过是非做点评论。在文献史料匮乏、封建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岁月里,历代史学家对赵佗往往采取贬多于褒的态度,特别是对赵佗的“割据”,表示深恶痛绝。有些历史学家虽然肯定赵佗对岭南的开发,但也不能容忍他的“割据”。本文针对这种现象,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次“割据”,但“割据”的性质各有不同,应具体分析。赵佗的“割据”是时代的赋予,无可厚非。从当时局势发展的角度看,不论是刘邦打赵佗,还是赵佗主动上钩,皆属下策。我们应该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全面衡量他在历史进程中到底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遏阻作用,才能对他的历史地位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研究南越国考古资料时,我深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南越国历史,必须上溯岭南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看到很多争论岭南先秦社会形态的文章,也促使我下决心熟悉这方面的考古资料。收入本书末尾的三篇文章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

《两广先秦文化》和《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讨论的焦点是先秦时期两广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的论证资料是当时广东已发掘的三十多座先秦墓和广西平乐银山岭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及同出陶器。论定这批墓葬的年

代大多属战国末到汉初,出土的青铜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文化关系。随葬器物没有一定规律,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等级区别,类似中原的那一套“礼乐制度”尚未出现,推测两广先秦社会可能还没有最后脱离原始社会形态。两广社会要到秦统一岭南,南越政权的建立,才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南越、闽越和夷洲的比较研究》的写作意图与上两篇近似。南越与闽越的兴亡轨迹基本一致,但两地的历史进程差异巨大。夷洲即今中国台湾,其社会发展进程又是另一种情况。该文利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史料,试论秦汉时期这三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变化,进而探讨造成不平衡的原因。

本书是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南越国史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虽尽心竭力,考察所及皆为南越国史文浅显之论,谈不上广度深度。尚需说明的是,收入本书的文章,写作年限跨度较大,又分散发表在不同书刊,个别内容难免稍有重复,敬希读者鉴谅。现在我已步入垂暮之年,无能为力,唯有希望后来的同行们继续努力。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委会的关爱并给予资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同志付出的辛勤劳动。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再次向他们表示谢意。

目 录

自序	(1)
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1)
从南越国墓葬看南越国	(45)
论南越国出土青铜器	(67)
论南越国出土铁器	(91)
铜提筒考略	(109)
南越王墓的丝缕玉衣和组玉佩	(125)
论南越王墓出土玉璧	(139)
角形玉杯赏析	(149)
高足玉杯赏析	(153)
南越国六夫人印	(159)
“朱庐执卦”印和“劳邑执卦”印 ——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	(165)
广州汉代考古与海交史研究	(173)
汉代南方牛耕与火耕水耨	(177)
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	(189)
从出土遗物看南越王的饮食	(198)
南越王墓出土文字资料汇考	(205)
南越木简选释	(234)
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墓主问题	(245)
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	(251)
南越政权与赵佗	(262)
赵佗年寿与第二代南越王	(272)

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	(275)
两广先秦文化	(307)
南越、闽越和夷洲的比较研究	(319)
附录:黄展岳考古学著作目录	(334)

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南越王墓的发掘，揭开了岭南汉初的文化宝库。^① 隐藏深邃的石室墓穴，以及埋葬在墓穴中的数千件奇珍异宝，为我们研究汉初岭南社会提供了最直接最形象的材料。我们本来打算在南越王墓的资料报道后面，写几点看法，作为这次发掘报告的总结。后来考虑到应该通过这次发掘，提出一个对南越国社会的比较全面的看法，但在着手撰写时，又感觉到仅就南越王墓的资料研究，将无法包括当时南越国西部（今广西）的问题以及南越国都城等问题，所以，我们决定以南越王墓发掘资料为中心，把过去发掘的南越国资料也适当收集，进行一次综合性的初步研究。

通过对南越国考古资料的初步研究，我们把资料能够反映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七类：都城（番禺城）、农业经济、重要的手工业、交通与贸易、度量衡制度、武器、墓葬。下面依次论述。

一 都城（番禺城）

“番禺”一名最早见于《淮南子·人间训》和《史记·南越列传》，稍后的《汉书·地理志》“南海郡”所载尤详。“南海郡”条下班固自注：“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又说，南海郡辖县六，番禺居首，“尉佗都”。清楚表明，番禺既是秦汉时期的南海郡治，又是南越国的都城。《史记·南越列传》记秦首任南海郡尉任嚣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反映了任嚣建

^① 广州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本文以下只标注书名、页码，编写单位和出版社、年份一律省去。

造的南海郡治番禺城是负山阻海，形势险要，颇具规模的。赵佗建南越国后，以秦南海郡治番禺为都城，必定又有所营建。

关于赵佗番禺城的所在地，直接的史料记载不多。除了上引《南越列传》“番禺负山险，阻南海”这一条以外，同书《西南夷列传》载，唐蒙在南越食到蜀地产的枸酱，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又同书《南越列传》记武帝元鼎六年汉平南越之战：“楼船将军（杨僕）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至番禺。建德、吕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九海，以船西去。”从这几段简短的记述中，可以推知番禺城址位于石门东南，珠江之滨。今广州市区有小北江，自石门沿增埗河顺流南下抵广州西村，应是汉伏波将军为营攻城处；由此入白鹅潭，江流分为两支，一支流往东南为珠江后航道，另一支东流即今市区的长堤、沿江路一段，应是楼船将军发起攻城之地。吕嘉、建德西去之船，大抵是由白鹅潭往西的一条古河道，经盐步、佛山，折向西北注入三水西南而溯西江主流。依水道位置推定，当日的番禺城应在今广州城区之内。^①

多年来的广州考古勘察发掘，证明秦汉番禺城确实在广州市区内。城内中心一直没有变迁，历代的民居、官署与城郭等遗存层层叠压，深埋于今广州市区的下面，给南越国都城的探明造成很大困难。

1976年，在珠江前航道北岸，位于今中山四路西段广州市文化局和儿童公园内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之际造船工场遗址，在遗址上面覆盖着南越国的部分宫署建筑遗迹。揭出的一段宫署走道，是用大型砖石铺砌的，长20余米，东北—西南延伸，走道两端不见尽头。从地形观察，宫署建筑可能在东北面。走道做工十分讲究。在砖石的路面下铺垫一层很薄的朱红色土，土质纯净。在这层朱红色土上面铺砌砂岩石板。石板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厚5—7厘米。分两行错列间砌，共宽1.15米。石路面的两侧各砌一行大型印花方砖作夹边，走道全宽2.55米。印花铺地方砖

^①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他》，《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边长 70 厘米见方，厚 12—15 厘米。在走道的北面发现砖质窗棂、涂朱瓦当，还有涂朱色、绿色的灰塑脊饰等宫室建筑残件。在走道上面还遗留许多残瓦片和木炭灰烬，覆盖一层厚 3—8 厘米的红烧土，有的地方炭屑成层。残瓦中有板瓦、筒瓦和模印“万岁”二字的瓦当和卷云纹瓦当，板瓦、筒瓦中有“公”、“官”、“卢”等文字的戳印。板瓦形体硕大，质地坚硬，与关中秦汉宫殿用瓦相比，并不逊色。^①联系上引《南越列传》元鼎六年“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的史实考察，证明这是南越国的一处重要宫署遗址。

南越国宫署的发现，为确定番禺城的具体方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广州考古工作者经常利用市区施工挖掘房基和地下管道的机会四出勘察，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把南越国都城的城垣范围基本上确定了下来：南垣大约在秦汉之际造船工场遗址之南约 300 米，即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大礼堂东侧；西垣大约在秦汉之际造船工场遗址的西边；北垣与宋代子城的北界相近，约当今东风路以南；东垣宋时为盐仓，约今之旧仓巷处。连接四边城垣，平面略近方形，周长约 5 公里。^②

广州南越国墓葬及其以后的汉墓分布，为南越国都城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旁证。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广州近郊已发掘几百座汉墓。经过分析、比较，判明墓葬分布离城区的远近与年代早晚相关联。南越国时期的墓葬，距离城区最近，说明当时城区最小；西汉中期以后，距离城区渐远，说明当时城区渐大。这种现象表明，汉武帝灭南越国后，番禺城内人口增多，城区扩大，所以才出现葬地愈来愈远的现象。广州南越国时期墓，西边最近点在人民公园至解放北路广东迎宾馆处，东边最近点在烈士陵园的红花岗，东西直线相距不足 2 公里。在这条直线的范围内，应该就是南越国番禺城的所在。红花岗、人民公园已是葬地，在当日应是附郊之野。如果推论可以成立，赵佗增益的番禺城大约是个周长十里的小城。

先秦时期，广州未出现城市。旧史所谓楚庭、南武城、五羊城，皆属

① 《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 页。

②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他》，《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附会之谈。只有任嚣始建、赵佗增益的南越国番禺城，才是岭南最早兴起的城市。^① 由于都城遗址几全泯灭，都城内的布局已无从究明。从出土的“长乐宫器”陶文、“长秋居室”、“泰官”等封泥以及建筑材瓦等判断，番禺城内的宫室布局很可能是模仿汉长安的都城建制，但规模要小得多。

二 农业经济

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许多农具、粮食作物、禽畜、水产品以及有关模型器，是研究南越国农业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南越国灭亡后才兴起的随葬模型器的习俗，其出土物也可作为南越国农业研究的参考资料。

在南越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没有发现可以确认为青铜农具的遗物。出土的农具，刃部皆铁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耜，直装木柄，下端木叶前端包嵌凹形的铁刃，或呈三角形的铁刃。另一种是锄，横装木柄，下端木叶前端包嵌刃口比较平直的凹形铁刃。耜主要用于挖坑（或挖沟）起土。锄用于中耕除草、间苗、松土、点种，也用于挖坑（或挖沟）起土，是古代南方农业生产中的“万能农具”，岭南地区农村至今仍广泛使用。耜和锄的铁刃宽度一般在10厘米或稍大一点，少于10厘米以下的刃口，大约是短柄的手锄或斧、铤。广西贵县西汉后期墓出土的全铁制的方直裤式锄和半环圆刃式锄^②，在南越国时期恐怕还没有出现。

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2件记田器的木牍，其一自题为《东阳田器志》^③。这2件木牍，可以帮助了解南越国的农具来源及使用情况。“田器”是汉人称农业生产工具的习用语。“田器志”就是墓中随葬农器的登记单。“东阳”是地名，春秋时鲁地、晋地、齐地皆有东阳。^④ 这里似指

^①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他》，《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管会：《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84—86页。本文以下简称《罗泊湾》，不再标注编写单位和出版社、年份。

^④ 参阅《辞源》“东阳”条，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秦置东阳县。秦末陈婴为东阳令史，率众 2 万人参加项梁起义，即此。故址在今安徽天长县（今天长市，下不再专门注）西北。牍文开列的农器名称和数量已部分漫漶不清，残存可辨的有“人桶卅”、“桶五十三”、“钁一百一十六”、“桶卅八其一郎”、“钁一百廿具”、“钁十五具”。^① 桶即甬、锸，钁即锄。钁，《说文解字》释为“锸属”，当亦与甬近似的起土农器。由此可以帮助说明，南越国的农器是从中原内地引进的，刃部嵌以凹形铁口的甬锄是南越国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农器。

收割作物可能已用铁镰，广州南越国墓（M1117）出土 1 件带有齿刃的弓形镰，后端圆筒形，较短，圆釜透底，以安木柄，通长 17 厘米。^② 这种形式的铁镰，可能也用于砍伐灌木、草莽。

南越国是否使用牛耕，史文无征。在南越国时期的遗址或墓中也没有发现铁犁铧（包括较原始的 V 形铁铧冠）及有关牛耕的遗物。《东阳田器志》是一份从中原内地引进农具的清单，牍文可辨认的全是甬、锄、钁，不见标志牛耕的犁铧和齿耙。水牛至今仍是珠江三角洲水田犁耕的主要畜力，在广东新石器时代和汉代遗址中都有水牛骸骨出土，但没有发现可供说明先秦或南越国时期岭南有用水牛犁田的任何痕迹。岭南目前已知的最早铁犁铧发现于贺县（今贺州市，下不再专门注）莲圻的东汉墓中，铧断面三角形，底面平，正面隆起，中空，以容犁头，这是当时已用犁耕的实例。^③ 《后汉书·循吏传·任延传》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建武初，任延任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如果这段记载可以理解东汉初牛耕已在九真郡推行，则岭南地区的铁犁牛耕，大概是在南越国灭亡之后，汉廷扩大这个地区的郡县建置，加强对南疆的统治之后才逐步推广的。

与农业相关的家畜饲养业也得到发展。南越王墓中发现很多猪、牛、羊的骸骨，还有少量鸡骨。在广州和贵县等地南越国时期的中小型墓中，也经常有鸡骨和其他家畜头骨出土。可见猪、牛、羊、鸡这类禽畜，已被

① 见《罗泊湾》，第 85 页；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

② 广州市文管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3 页。本文以下只标注书名、页码。

③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